

# 综 述



# 国际关系体系与亚太安全保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刘江永

从广义上讲 国际关系体系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关系所构成的国际格局，以及国际法规和国际力量对比所决定的国际秩序等。从狭义上讲 国际关系体系 主要是指一定时期内的国际力量对比，以及各种国际力量相互关系所构成的国际关系格局。

这种国际关系体系 或曰国际格局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时代特点。就国际关系体系的本质而言，可以把历史上的殖民主义时代与二战后的非殖民主义时代加以区分，从中发现当代国际关系体系的时代特征，以利我们在新的世纪共同努力塑造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的国际关系体系。

## 一、非殖民主义时代的多极化 有利于世界和平

一般认为，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可以追溯到 1618 年至 1648 年三十年战争后欧洲各国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sup>①</sup>它第一次以国际条约的形式确定了欧洲大陆各国的国界，从而形成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当时 世界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时期 它较之中世纪封建制度是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是 由于它是建立在欧洲列强对外殖民扩张基础之上的，因而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也可以说是殖民主义时代的产物。

在长达约 400 年的殖民主义时代，国际关系体系往往是通过战争形成，又通过战争被打破的。不是战争破坏原有的国际格局，就是某种国际格局被打破而导致战争。从罗马帝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法国、沙俄、大英帝国、普鲁士、日本帝国到美国，各大列强此起彼伏地争夺殖民地，引起一场场战争。国际关系体系基本上是在一极主宰、多极争霸、大国均势和两大军事集团对抗这几种类型的国际格局之间转换。其中任何一种形式都无法长久地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20 世纪上半叶，殖民主义发展到顶点，进入到它的最高阶段，即最后阶段——帝国主义。在世界殖民地已被瓜分完毕的情况下，后起的帝国主义不再可能通过直接扩大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来争夺世界霸权。于是它们结成军事集团，通过向其他宗主国开战来夺取其殖民地，谋求建立世界霸权。这在半个世纪内先后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空前浩劫。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人数达 1000 万人，约等于此前 1000 年间欧洲历次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sup>②</sup>一战后，在英、美、法、意、日等国主导下形成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但时隔不到 20 年，这一国际格局就被帝国主义列强的争夺所打破。随即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又造成 5000 万人死亡，如果把平民计算在内，死亡人数总计约 9000 万人。<sup>③</sup>东亚地区国际关系体系作为全球国际关系体系的子系统，也反映出这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中国从 1840 年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日本则从 1868 年明治维新后走上一条“脱亚入欧”、“富国强兵”、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朝鲜半岛和中国的台湾首当其冲地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对象。而受到削弱的中国大陆则成为列强争霸亚洲的重点和日本扩张的主要对象。从 1894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1904 年日俄战争、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到 1941 年的太平洋战争，列强之间围绕中国的争夺战使亚太地区持续了长达

半个世纪的战乱年代。两次世界大战，亚太地区都是主战场之一，所不同的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反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后来转变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55年前这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导致战后殖民主义体系的解体，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一，美苏通过建立雅尔塔体系，划分战后势力范围，形成美苏两极体制。据前不久解密的美1963年有关文件称，若美国遭到苏联的核打击，将有1.5亿人丧生。<sup>④</sup>这也是美苏冷战没有转化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第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蓬勃兴起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殖民主义体系土崩瓦解，战后新独立的国家有100多个，它们形成第三世界。联合国成立之初只有51个成员国，到2000年9月已达189个。第三，中国告别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和一百多年被列强侵略奴役的历史，成为国际新格局中的一支独立的重要力量。第四，日本放弃了战前的军国主义道路，成为依赖美国保护的盟友和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五，西欧与美国结成北约集团，并开始了欧洲经济、政治、安全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从20世纪60年代起，世界国际关系体系便开始出现非殖民主义时代的多极化趋势。

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曾经指出，今后5到15年将出现美国、西欧、苏联、中国、日本这五大“超级经济力量”，这五大力量将决定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的世界经济前景和其他方面的前途。<sup>⑤</sup>尼克松的话似乎只说对了一半，即美国不可能单独主宰世界，但他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基本事实。这就是殖民体系的瓦解和第三世界的崛起，使国际关系体系的性质和结构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性变化。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非殖民主义时代下的国际关系体系，国际社会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多种国家发展模式竞争状态。第三世界广大发展

中国家的独立，打破了少数大国主宰世界命运的历史。它们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多极化国际格局中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正是由于殖民地体系的解体，历史上的列强才难以再度发动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后起或新兴的国际力量，才有可能成为当今世界多极化国际格局的和平力量。当今世界的多极化趋势之所以不会导致历史上的多极争霸，反而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关键在于原有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和第三世界主权国家的兴起。

2000年9月6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150多位国家元首聚集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举行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这在国际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明确指出：“推动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是时代进步的要求，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这种多极化格局，不同于历史上的大国争霸、瓜分势力范围的局面。大国对于维护世界和平负有重要的责任，大国应该尊重小国，强国应该扶植弱国，富国应该帮助穷国<sup>⑥</sup>。这是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关系体系发表的最新观点，我完全赞同。”

## 二、本世纪国际关系体系的变迁与中日关系

20世纪以来国际关系体系出现了四个不同时期，而每个时期的中日关系也是不尽相同的（见下表）

## 国际关系的变迁与中日关系

时 期	两次世界 大战期间	二战后至 70 年代	20 世纪 70—90 年代	20 世纪 90 年代— 21 世纪	21 世纪 —?
国际体系 类 型	多极对抗	两极对抗	两极多元	一极多元	多元共存
国际安全 模 式	军事同盟 势力均衡	军事集团 核 威 慑	同盟、核威 慑势力均衡	同盟、联合 国、多边安 全对话	联合国、 多边安全 对话
大国目的	领 土 殖 民 地	势力范围 世界霸权	综合国力 霸权地位	综合国力 国际地位	国内稳定 国际和平
决 定 性 角 色 因 素	军事力量 世界列强	军事力量 美苏两超	军事、经济 多元力量	经济、科技、 军事、国际 机构多元 协调	科技、经济、 军事国际 机制
世界经 济 体 系	殖民经济 封闭集团	两大阵营 两大市场	过渡性全球 市场经济	世界经济 区域化、 一体化	世界经济 一体化、 区域化
国际关系 性 质	霸权争夺 弱肉强食	权力政治 对抗竞争	权力政治 相互依存	相互依存 权力政治	相互依存 国际协调
国际秩序 特 点	霸权横行	垂直型 强权政治	新旧秩序 转换过渡	倾斜型准 平等协商	水平型 平等协商
战 争 与 竞 争 方 式	世界大战	冷战与局 部战争	冷战、局 部战争与 经济竞争	经济竞争、 内战与局部 战争	经济竞争 局部冲突
中日关系	日本侵略 中 国	中日对立	中日邦交 正常化	矛盾中求 发 展	世界中的 中日关系

第一个时期是 20 世纪前 50 年的多极对抗体系。

这半个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国际关系体系处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多极对抗。国际安全的模式是军事同盟与势力均衡。大国争夺的目的是获得更多的领土和殖民地。在国际关系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角色是世界列强，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军事力量。世界经济体系是殖民地经济和封闭的经济集团。国际关系的性质是弱肉强食。国际秩序的特点是战争与霸权横行。战争的形式是世界大战。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和国际关系体系下日本不断发动侵华战争直至这一国际关系体系的破灭与日本战败投降。

第二个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 70 年代的两极对抗体系。

世界处于冷战时代的美苏两极对抗。国际安全的模式是两大军事集团与核威慑。超级大国争夺的目的是建立势力范围和世界霸权。在国际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角色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仍然是军事力量。世界经济体系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体制下两大阵营的两大市场。国际关系的性质是权力政治的对抗与竞争。国际秩序的特点是垂直型强权政治。战争或竞争的主要形式是冷战与局部战争。在这种两极对抗体系中，中日关系基本上处于对立状态，但并未发生战争。这主要是由于世界处于冷战时代日本在经济、安全等各方面全面依靠美国其外交缺乏自主性，只能追随当时美国的反华反共政策。

第三个时期是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的多极化，更确切地说是两极多元体系。

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出现了美苏冷战时代的多极化进程。这种多极化与战前的多极争霸国际格局完全不同。其基本特征是，在殖民地体系瓦解后出现了两极多元并存，也可以称之为“两超与多强”并存的国际格局。冷战主要在美苏两极之间展开，国际

安全模式除了原有同盟、核威慑之外，多元力量的崛起也对制约世界大战起到了一定作用。大国争夺的目的是提高综合国力和谋求霸权地位。对国际关系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角色是两超与多元国际力量，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军事、经济、科技等多元因素。世界经济体系是过渡性的全球市场经济。国际关系的性质是权力政治伴随着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国际秩序的特点是垂直型强权政治开始向国际民主化方向转型。战争或竞争的主要形式是冷战、局部战争与经济竞争。

在两极多元国际关系体系下，美日两国都不能再无视中国的存在。中日两国作为国际上的多元力量日益发展，终于冲破了两极体系的束缚，于 1972 年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第四个时期是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的一极多元体系。

两极格局的消失，实际上只是消失了苏联一极，而美国作为另一极仍然存在。因而国际关系体系出现了美苏冷战后时代的一极多元结构，也可以称为“一超多强”结构。从世界力量对比看，美国综合国力仍居世界之首，是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另外还有欧洲、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等多强。在亚太地区，这种一极多元结构也很明显。除美国一极外，中、日、俄、东盟、澳新、朝鲜半岛等多元力量同时并存。国际关系中第一次出现了“伙伴化”的趋势。

在一极多元国际体系下，国际安全模式并未完全摆脱同盟的形式，但两大军事集团对抗业已消失，联合国与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作用增大。大国竞争的目的是提高本国综合国力。对国际关系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角色是多元化的国际力量与国际组织，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经济、科技、外交、军事等多元力量。世界经济体系的区域化与全球化趋势加强。国际关系的性质是相互依存方面的因素上升，而权力政治的因素相对下降。国际秩序的特点是倾斜型准平等协商，即超级大国主宰地位下降，但国际决策权的大小仍与国家经济、政治实力成正比，尚难做到完全平等。竞争或战争的

主要形式是经济竞争、内战与局部战争。在这种一极多元的国际体系下，中日关系的特点是在矛盾中合作，在协调中发展。日本自主性增强，虽难以完全摆脱美国这一极，但中日关系受中美关系的影响在相对减弱。另一方面，两国之间固有矛盾的影响则相对增强。例如台湾问题与历史问题。另外，苏联威胁消失后，日美国内又出现“中国威胁论”。日美加强了以中国崛起为背景的军事合作。但从总体上看，在非殖民主义时代，日本很难重走军国主义老路，中日两国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是历史的必然。

### 三、21 世纪国际关系体系与亚太安全

新世纪的国际关系不能不带有过去时代的某些痕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世纪之交，国际关系体系正处于十字路口，今后可能出现以下三种前景：

其一，多极对抗体系。国际间多种国际力量的崛起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抬头，以及冷战时期遗留的对立因素上升，将会导致多极对抗。在经济方面表现为单方面经贸制裁引起的贸易战，以及排他性经济集团的出现。在政治与安全方面，欧洲可能因处理北约东扩失败面临新的对立。在亚洲，如果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得势，有可能刺激军事方面的相互戒备与敌对意识。再过 30 年，美国虽然仍可能保持世界头号军事大国的地位，但综合国力将相对衰落，难以像目前这样承担对亚太的“安全义务”。美国一些人会继续主宰亚太，有可能企图更多地利用亚洲国家之间的矛盾，以亚制亚或要求盟国增强军事力量。结果，日本有可能逐步发展为军事上独立的一极，东亚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也将大为增强，从而导致本地区的军事力量多极化、国际关系对抗化。这种局面是应该并可以避免的。

其二 多元共存体系。美国‘一超’相对削弱 而国际经济、政治体系向多元共存方向过渡。这一点在亚太地区表现得比较明显。多元共存 反映了亚太地区的多样性与亚太力量的多元化 代表了历史发展的主流，即亚太地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与意识形态国家间和平共处、互利发展的潮流。在经济领域 多元共存主要表现在本地区提倡的“开放的地区主义”它有利于缓解欧美等世界其他地区经济集团的排他性。在政治领域，中日都不谋求成为美苏那样的一极，而是作为多元力量之一发挥本国特长来为世界做出贡献。亚太中小国家虽不构成一极，但也可发挥重要作用。这是比较理想的发展前景。

其三 多元一体体系。它是多元共存体系的延伸 将摆脱单极独霸、两极或多极争霸的传统模式 而朝多元一体方向发展。在国际政治领域 以联合国为主体 多元力量共同制订国际规则 既相互协调又彼此制约 在世界经济领域 以世界贸易组织和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为主体，多元力量既相互竞争又彼此合作。东盟地区论坛（ARF）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好比是亚太和平与发展的两大车轮。在 21 世纪，亚太地区将以 APEC 为主体实现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合作多元化与网络化，实现开放的地区合作，并以 ARF 为主体构成多元化、网络化的地区政治、安全协调机制。各国军队将主要用于维护本国国内稳定和抢险救灾，亚太各国军事力量将成为维护各国共同安全利益的“国际公共财产”，双边及多边的相互信赖措施的普遍建立，将使各国间彼此的戒备性相对减少，而合作性增大。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但这种历史进程似乎已经开始了。这是人心所向，从哲学上讲，这一进程就是要恢复世界的本来面貌。因为世界万物都是多元一体结构。在这一国际关系体系的转型期，中日两国的国际地位与中日关系，也将对 21 世纪国际关系体系产生巨大影响。今后，台湾问题可能成为焦点。如

果台湾能与中国大陆顺利实现统一，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就可以得到总的清算。中日关系、中美关系均将取得全面发展，日美关系也将随之得到中国的理解和接受。随着中日两国国际经济、政治地位的上升与中、美、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国际关系体系将向多元共存方向迈进。

注释：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9 页。

萧洪等主编《20 世纪世界通鉴》上卷，广州出版社 第 35、38 页。  
同上。

④ 日]《朝日新闻》2000 年 8 月 20 日。

⑤ 何春超等主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1945 - 1980》法律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434—438 页。

⑥ 《人民日报》2000 年 9 月 7 日。

# 中日美三国关系与东亚的安全保障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米庆余

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体制终结后，影响东亚国际关系和安全保障问题的主要因素是中日美三国关系。这可以说已经是不必争论的事实。当然，其他因素如中俄关系、日俄关系等等，也会对东亚的国际关系和安全保障问题产生影响。但是，中日美三国关系的改善和稳定，对东亚的国际关系和安全保障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着重研究中日美三国关系，又是研究东亚国际安全保障问题的关键。这也是本文立论的基点。

## 一、东亚地区缺少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机制 美国对东亚的国际关系应负主要责任

东亚地区泛指亚洲东部，是涵盖东北亚与东南亚的地理概念。

现今东亚各国的社会制度并不相同，思想意识和经济发展也有差异。战后五十余年，东亚地区并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机制，但却存在或依然存在以美国为主体的各种条约关系。例如，1951年形成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同年签署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1953年缔结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形成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以及同年美国与中国台湾当局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等。

上述条约所形成的国家或地区关系，尽管后来有所变化，但基

本上没有改变战后以来以美国为主体而形成的条约关系，而且具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特征：

其一，以美国为主体而形成的上述条约或同盟，从其产生或形成的宗旨而言，是以战后开始的美苏冷战对峙或以反共、反社会主义为背景的。1948年1月，美国陆军部长罗雅尔在一次讲话中，便公开表示要把日本作为对付共产主义的“防波堤”；1954年4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进一步言称：“在东南亚，如果有一个国家落入共产党手中，那么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就会像多米诺骨牌那样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sup>①</sup>这些说法实际正是战后的美国插手东亚地区，并连续结成各种条约关系的背景。

其二，上述条约或同盟所形成的国家或地区关系，是以美国在东亚保持军事力量为前提的，而且具有军事同盟或冷战对峙的性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中明确规定：“为了更有效地达到本条约的目标，缔约国将分别或共同地以自助和互助的方式来保持并发展他们抵抗武装进攻的个别的和集体的能力。”<sup>②</sup>《美澳新安全条约》也是如此。<sup>③</sup>而1951年形成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则是以美国在日本保留驻军，日本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为主要内容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开承认：“有些人说，我们被带到了战争的边缘。当然，我们是被带到了战争的边缘……但是如果你不能掌握它……如果你被吓得不敢到达边缘 你就输了。”<sup>④</sup>

其三，上述条约或同盟所形成的国家或地区关系，实际是美国推行对外政策的工具。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 美国利用美日条约使日本变成了美国对朝战争的后方基地。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同样1963年美国卷入越南战争以后，《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的成员国——菲律宾和泰国，也曾追随美国介入其间，而美国空军对越南进行的狂轰乱炸，也是从美国在日本冲绳的军事基地起飞的。

由此可见，上述条约或同盟所形成的国家或地区关系，并不是

东亚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机制。而上述条约或同盟关系的形成却说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和作用是举足轻重的。美国的对外政策对东亚地区关系的形成，具有某种决定性的作用和某种决定性的影响。

当然，时代在发展，东亚地区的国家关系也在变化。如 1976 年 2 月东盟国家举行第一次首脑会议，共同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1977 年《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宣布终止。1978 年美国宣布终止实施对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等。但是时至今日，美国介入东亚并影响东亚安全保障关系的地位并没有变，特别是美苏冷战体制终结后，美日两国间的同盟关系反而通过“重新定义”而扩大了军事合作的内容与范围。

1996 年 4 月 17 日，美日两国首脑经过会谈而发表的《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面向 21 世纪的同盟》中写道：

“冷战终结后，发生世界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正在减少……但是亚太地区依然缺乏稳定性和可靠性。朝鲜半岛的紧张正在继续，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事力量依然在大量地集中，未解决的领土问题、潜在的地区纠纷、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手段的扩散，是造成整个地区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为此，两国首脑“强调了日美两国对付所面临的安全保障课题的重要性”，再次确认了日美之间的同盟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

两国首脑认为：“日美两国密切的防卫合作，是建立在自卫队适当的防卫能力和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配合之上的”，为了进一步强化日美两国间的信赖关系，“两国政府要进一步加强交换有关国际形势、特别是有关亚太地区的情报和意见。同时要继续就有关对应国际安全保障形势可能发生的变化，包括最充分地满足两国政府所必需的防卫政策，以及美军在日兵力构成的军事态势，进行密切协商。”<sup>⑤</sup>

也就是说，美苏冷战体制终结后，美日之间所确立的“面向 21

世纪的同盟”依然是建立在冷战思维之上的军事同盟，并不是基于冷战体制的终结，而寻求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相互合作与理解。1997年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也即人们所说的新防卫指针）<sup>⑥</sup>，可谓更加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

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内容，不仅包括美日两国“日常进行的合作”而且包括所谓“日本周边地区的事态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构成重要影响时的合作”。进而则是具体规定：“在自卫队与美军实施共同作战时，双方要确保一致，并适时地以适当的形式运用各自的防卫能力。是时，双方要有效地统一运用各自的陆海空军部队”；“自卫队和美军要共同实施为了防卫日本周边海域的作战，以及为了保护海上交通的共同作战”等等。<sup>⑦</sup>

进而则是建立双方“后方支援”体制，内含相互救援、战区搜索、监视和警戒、提供情报、海空输送物资和武器弹药、海上扫雷、现场检查不明船舶、营救非战斗人员等等。日本前防卫次官西元承认：“战斗行为的广泛含义，不仅包括战斗部队，也应包括所有的后方活动。从这种意义上看，运输、通信比在前线作战的士兵更加重要，医疗也不能看作是战争以外的行动。”<sup>⑧</sup>

换句话说，美日安保条约的“重新定义”实际是构成了冷战后的美日东亚政策的基本态势，并通过军事、政治、经济、技术的密切合作，建立了强有力的、与北约组织遥相呼应的外向型的军事同盟。

就美日安保条约的“重新定义”而言，其中固然含有日本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追求。但是，从战后以来东亚国际关系的形成与发展而言，美国对东亚的国际关系和安全保障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与此同时，美日安保条约的“重新定义”更加表明，现今在东亚地区、特别是在中、日、美三国之间寻求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机制，已经成为东亚乃至亚太地区所面临的首要任务。

## 二、美日安保条约的重新定义应该反思 东盟国家组织的发展方向值得重视

如上所述，美苏冷战体制终结后，美日安保条约的“重新定义”并不是东亚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机制。这与大多数东亚国家要求和平与发展的愿望是相去甚远的。因此，从寻求和确立东亚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机制来讲，对美日安保条约的“重新定义”应该进行反思。

其一，美日安保条约的“重新定义”是以美日两国的国家利益为基础的。

《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面向 21 世纪的同盟》中宣布：“首相和总统一致认为，日美关系的三个支柱——安全保障、政治和经济，都是建立在两国共有的价值观及利益之上的，而且是建立在日美安保条约所体现的相互信赖的基础之上的。”<sup>①</sup>

进而，1996 年 4 月 17 日，美日两国首脑在《致日美两国国民书——面向 21 世纪的挑战》中再次重申：“日美两国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关心和共同的愿望，并作为同盟国与伙伴而迈向 21 世纪”；“我们两国的同盟关系，对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及繁荣具有核心的重要性，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对日美两国极其重要”等等。<sup>②</sup>

也就是说，美日安保条约的“重新定义”不仅扩大了美日两国军事合作的范围，而且仅仅是以美日两国“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关心和共同的愿望”为基础的。这种狭义的国际观，实际是以满足美日两国的国家利益为基础的。而东亚各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并不相同，经济发展水平也不相同，美日两国的价值观、美日两国的关心和愿望不能替代东亚各国的价值观，也不能代表东亚各国的国家利益和愿望。